

政党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以色列工党兴衰分析

吴诗尧

摘 要: 作为以色列的建国政党,以色列工党曾连续执政多年。1977年议会大选失利后,以色列工党的政治地位开始衰落。21世纪以来,以色列工党始终无法赢得议会大选,且得票率和议席数屡创新低,衰落态势加剧。为扭转颓势,以色列工党采取的关键举措之一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转向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这也是该政党对其政治地位衰落所作出的重要回应。可以说,意识形态的转变既折射出社会环境剧变、原有政策弊端凸显且趋于失灵、政党组织力量削弱等引发以色列工党政治地位衰落的问题,也揭示了以色列工党寻求复兴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包括如何适应社会剧变、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建设、恢复自身组织力量等。

关 键 词: 以色列政治; 以色列工党; 政党意识形态;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作者简介: 吴诗尧,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10002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20)05-0067-18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 30 年代至 70 年代,以色列工党(Israel Labor Party,以下简称“工党”)在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①这一时期,以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工党带领犹太劳工和移民先驱于 1948 年取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胜利,建立了以色列国,继而领导这个新生国家在较短时期内站稳脚跟、奠定国力基础,使以色列真正实现立国。但 1977 年议会大选的失利终结了工党自建国以来的连续执政地位,也开启了工党在政坛的衰落进程。进入 21 世纪以来,工党在议会大选中的得票率和议席数更是屡创新低,政治地位衰落态势加剧。为扭转政治地位衰落的不利局面,工党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在意识形态上转向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Post-Labor Zionism),以此来回应导致其衰落的主要诱因。意识形态的转变既折射出工党衰落的原因,也揭示了该党寻求复兴所面临的挑战,为观察和研判工党的发展轨迹提供了一种分析视角。

一、以色列工党政治地位的衰落

在实行议会共和制的以色列,国家议会(Knesset^②)掌握立法权力并产生内阁,是该国政坛的主舞台。以色列国家议会每届任期 4 年,设有 120 个议席,由通过议会大选的各政党代表组成,进入议会的各政党根据大选得票比率分配议席数。新议会产生后,以色列总统任命最有可能获得超过议会半数支持的政党领导人在规定时限内组建执政联盟,筹建新内阁。诸事俱备后,通过议会信任投票的新总理方可带领新任内阁就职。^③可见,以色列政党的政治地位直接取决于它在大选中的表现和议会议席数。

以色列民众习惯将该国 1977 年的议会大选称为“大变革”(Mahapach^④),在

^① 以色列工党的起源可追溯到 1905 年由亚伦·大卫·戈登(Aaron David Gordon)建立的青年工人党(The Young Worker)和 1919 年由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建立的劳工团结党(Labor Unity)。这两个政党于 1930 年合并成巴勒斯坦工人党(Workers' Party of the Land of Israel,希伯来语音译为 Mapai,马帕伊),开始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工人党的领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 1948 年取得胜利,以色列宣告建国。1968 年,巴勒斯坦工人党经改组和整合,更名为以色列工党。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以色列工党和巴勒斯坦工人党统一简称为“工党”。

^② 该词源于古希伯来语“大会议”一词,指根据犹太传统,由 120 名文士、圣贤和先知所组成的大型会议,现为“大型集会、聚会”之意,一般特指以色列国家议会。

^③ 参见“Basic Law: The Knesset-1958,”Knesset, https://www.knesset.gov.il/laws/special/eng/basic2_eng.htm “Basic Law: The Government-1968 (Original Version),”Knesset, https://www.knesset.gov.il/laws/special/eng/basic2_eng.htm, 登录时间:2019 年 11 月 26 日。

^④ 希伯来语意为“动荡”或“起义”。

当年大选中,自以色列建国伊始便连续执政的工党首度遭遇失利,并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①工党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一直领导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导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区的政治生活,其在1977年以议会选举中的失利无疑是该党的政坛滑铁卢。此后,工党政治地位的衰落持续加剧。

工党政治地位的衰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1977年至2000年。在此期间,工党由连续执政的主导政党衰落为同政治对手竞逐政权的主要政党。这一时期,工党在7届议会大选中4次当选,其余3届则是利库德集团(Likud)取胜,两党交替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从得票率数据来看,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在其中4届大选的得票率相当接近,以至于1984年和1988年议会大选后,两党不得不同其政坛劲敌组成“国家联合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联手执政(见表1)。因此,这一时期以色列的政治格局已从工党一枝独秀演变为两党分庭抗礼,工党的政治地位呈现波动式滑落的态势。

表1 1977年至2000年间以色列议会大选选况摘要

大选时间	工党		利库德集团	
	得票率(%)	议会排名	得票率(%)	议会排名
1977年5月	24.6	2	33.4	1
1981年6月	36.6	2	37.1	1
1984年7月	34.9	1	31.9	2
1988年11月	30.0	2	31.1	1
1992年6月	34.7	1	24.9	2
1996年5月	26.8	1	25.8	2
1999年5月	20.3	1	14.1	2

资料来源 “Knesset: History,” *Knesset*, https://www.knesset.gov.il/history/eng/eng_hist_all.htm, 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3日。

第二个阶段是自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工党在以色列政坛的衰落趋势进一步加剧,不仅无法赢得议会大选,且得票率和议席数均持续下跌,长期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近乎沦为以色列政坛的边缘政党。在21世纪以来的8届以色列议会大选中,工党屡战屡败,得票率、议席数和议会排名总体上持续下降(见表2)。与此同时,连续18年未能组阁执政的工党已近10年未能入阁参政,逐渐远

^① Udi Lebel, Moshe Fuksman-Sha'al and Eithan Orkibi, “‘Mahapach!’: The Israeli 1977 Political Upheaval-Implications and Aftermaths,” *Israel Affairs*, Vol. 24, No. 6, 2018, pp. 939-943.

离以色列政治舞台中心。^① 近年来,深陷困境的工党的颓势进一步加剧,在以色列政坛的地位日趋边缘。

表 2 2003 年以来历届以色列议会大选选况

大选时间	工党			议会最大党
	得票率(%)	议席数	议会排名	得票率(%)
2003 年 1 月	14.5	19	2	29.4
2006 年 3 月	15.1	19	2	22.0
2009 年 2 月	9.9	13	4	22.5
2013 年 1 月	11.4	15	3	23.3
2015 年 3 月	18.7	24	2	23.4
2019 年 4 月	4.4	6	6	26.5
2019 年 9 月	4.8	6	8	25.9
2020 年 3 月	5.8	7	6	29.5

资料来源 “Knesset: History,” *Knesset*, https://www.knesset.gov.il/history/eng/eng_hist_all.htm, 登录时间: 2020 年 4 月 20 日。

二、以色列工党意识形态的转变

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和以色列建国初期,工党以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带领犹太劳工和移民先驱实现民族复国愿望,奠定了以色列的国力基础。1977 年议会大选失利后,工党的政治地位走向衰落,着手全面反思和调整。在意识形态领域,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内涵和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转变为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一) 转变之前的工党意识形态: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唯有通过犹太工人阶级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工农生产劳动,犹太国家的重建和复兴才能实现。在实践中,为尽可能汇集政治支持和调集社会资源推进复国运动、促进实力增长,工党逐渐将其他思想流派

^① 经过 2019 年 4 月、2019 年 9 月和 2020 年 3 月三次大选后,得票率最高的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Blue and White)最终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各自党首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和本尼·甘茨(Benny Gantz)在任期内轮流出任以色列总理。经由党内表决,工党决定加入联合政府,现任工党党首阿米尔·佩雷茨(Amir Peretz)将出任联合政府的经济与工业部长一职。Chaim Levinson, “Netanyahu, Gantz Sign Coalition Deal to Form Government,” *Haaretz*, April 20, 2020.

的观点及理念吸收进本党的意识形态,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发展成为以四大理论为基础的复兴犹太国家的思想体系。

1.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

19世纪欧洲国家爆发的一系列反犹排犹事件导致当地犹太人的生存状况急剧恶化,一部分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些知识分子关于犹太民族前途命运的思考,最终形成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目标、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①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指出,犹太人问题的本质是民族问题,解决民族问题须将其政治化,使之成为文明大国和相关国家关注并考虑的国际政治议题。因此这一理论的基本实践思路是,运用外交手段争取大国对犹太人的政治支持,同时组织同胞向本民族购置的巴勒斯坦土地大规模移民,在当地形成完整的犹太社会,进而推动犹太国家的最终建立。这个国家将吸纳所有想要保持民族身份的犹太人在此生活,犹太人问题将由此得到解决。^② 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使犹太民族的复国愿望由传统观念转化为政治诉求并进一步发展为政治运动,其政治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思路被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继承,并构成后者思想和实践的逻辑起点。

2.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一部分犹太知识分子尝试将社会主义学说作为理论工具,分析犹太人问题的成因和特征,进而探索解决办法,形成了坚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指导复国运动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从生产力入手,认为社会的基本形态呈金字塔状,由下至上分别是劳动者、中产居民和资本家三个阶级,其中只有劳动者阶级才具备生产力,是社会的真正基础。而大流散中因种种条件限制而被迫散居的犹太人多从事简易商贸,鲜有投身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因此并不具备社会发展所需的生产力。这导致犹太人始终难以获得各国社会的真正接纳,从而引发了犹太人问题。^③ 同时,该思潮还从资本主义社会特质的角度分析了犹太人问题的必然性,指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分配极其不均、权力分布严重失衡、社会平等

^① 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焚毁第二圣殿,驱离当地犹太居民。犹太民族自此被迫开始背井离乡、四海漂泊的“大流散”(Diaspora)。大流散期间,不少欧洲国家都声称存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即由于文化差异、生活隔阂、宗教冲突、固有偏见等原因,犹太民众无法获得所在国家的认可和接纳,屡遭歧视、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② Theodor Herzl, "The Jewish State," in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1997, pp. 204-225.

^③ Mitchell Cohen, ed., *Class Struggle and the Jewish Nation: Ber Borochov's Selected Essays in Marxist Zionism*, London: Transaction Books, 1984, pp. 168-172.

与自由高度匮乏,而欧洲犹太人却普遍身处各国底层,远离政治权力、公民权利和资本财富,沦为社会中的弱者。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犹太人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①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由此指出,唯有藉由犹太工人阶级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犹太国家,才能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建国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犹太工人阶级、工人政党及工会组织,自然将担任国家的领导角色。在犹太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这个新兴犹太国家的生产关系同其社会生产力保持适配,犹太民众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平等”“公正”“自由”等一系列社会主义价值也将得以实现。^②

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将社会主义学说应用于民族主义运动的尝试。有关发展犹太民族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张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它秉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价值内核。

3. 劳工学说

劳工学说从大流散中犹太民族的特性切入,阐释了体力劳动对于犹太民族恢复正常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意义。该学说指出,长期的大流散使犹太人远离体力劳动,切断了他们同自然的联系,导致犹太民族成为只能适应城市生活且在经济、文化、精神等各方面都寄生于别国社会之中的非正常民族。这种寄生状态是犹太人问题产生的根源。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将广大犹太民众转变为劳动者,通过他们的体力劳动重建犹太民族与自然的联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犹太民族藉由自身劳作重新在其家园扎根的活动,不论其所建成的犹太社会最终采用哪种社会形态,都必须成为满足犹太劳动者们各种生产需要的生产体系。^③

对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工学说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产生共鸣,同时在民众日常生活与复国政治运动之间建立联系,为犹太大众践行复国目标提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劳工学说由此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实践思路。劳工学说和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交互影响还催生出了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会特有

^① Nachman Syrkin, “The Jewish Problem and the Socialist Jewish State,” in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pp. 330–351.

^② Berl Katznelson, *Socialism Zionism: Neglected Value* (in Hebrew), Tel Aviv: Am Oved, 1941, pp. 25–28.

^③ Aaron David Gordon, “People and Labor,” in Arthur Hertzberg, ed., *The Zionist Idea: A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Reader*, pp. 372–375.

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基布兹”(Kibbutz^①)。^②遍及巴勒斯坦全境的基布兹按平等主义和民主管理原则组织其成员投入农业劳作和工业生产,所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与个人收入归集体所有和支配,同时取消商品、市场和货币而按需分配生活必需品,基布兹为成员们提供了安全、教育、医疗、福利等当地稀缺的公共产品。^③

4. 国家主义

希伯来语中的“马拉克提坞特原则”(Mamlakhtiyut)被译作“国家主义”(Statism),它是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关于国家根本价值及相应的权力运行机制的思考,也是工党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

国家主义将国家自身视为根本价值,以国家的存续和发展为其根本目标,主张赋予国家机构体系巨大权力以确保国家安全、加速社会发展。这一学说强调,公共安全、社会管理、为国民提供服务等工作是理应且只能由国家承担的重大义务,为履行好该职责,国家应当获得同这项义务相匹配的权力。^④在具体实践上,国家主义认为,应通过统一国民教育体系、整合国防武装力量、指导和管理经济运行等综合措施,构造出一体化的国民身份认同、提升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强化国家机器的行动能力,从而推动国家实力的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国防安全。^⑤国家主义是工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结合自身经历和现实环境所形成的经验性理论。这一学说在以色列建国后逐渐成为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 转变之后的工党意识形态: 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

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关切转向具体事务,其主要逻辑是通过设定和规范以色列政府在国防、经济、民生等领域的基本政策思路,旨在推动本国的国防安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包括两大理论。

① 希伯来语意为“聚集”。

② 高放《以色列“基布兹”的奇迹》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3期,第123页。

③ Henry Near, *The Kibbutz History: Origins and Growth, 1909-19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3-22.

④ Raphael Cohen-Amagor,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Israeli Nation-Building Ide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7, No. 4, 1995, pp. 461-484.

⑤ Nir Kedar, “Ben Gurion’s Mamlakhtiyut: Etym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Roots,” *Israel Studies*, Vol. 7, No. 3, 2002, pp. 117-133.

1. 社会民主主义

现行的工党党章明确规定社会民主主义是工党的基本指导原则。^①近年来,工党参加议会大选的竞选纲领清楚地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该党认知社会与政策思考的最主要理论工具,并且大有彻底取代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成为工党意识形态的趋势。

经济上,工党放弃了以往凸显公有制与计划经济重要性的国家主义路径,转而将自由市场、平等机会、公平竞争、公共服务、非剥削性雇佣确立为国家经济的基本要素,认为政府的经济管理应仅限于保障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范畴内。例如,工党在 2015 年的竞选纲领中表示,以色列国民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自由市场、平等机会、公平竞争,同时要谨防资本家危害国民经济运行”^②。

政治上,工党逐渐淡化了此前的社会主义取向和阶级立场。一方面,工党已不再谈论社会主义的理念和目标,而只承诺“以色列将始终是一个犹太民主国家,它的犹太价值和民主价值将进一步强化”^③。另一方面,工党由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全民政党,以国民本位取代阶级本位。这番转变表现在近年来工党对以色列国家性质的理解上,2003 年至今的历届工党竞选纲领,都无不强调“以色列是基于复国主义的民主性犹太民族国家”^④。

文化上,工党转向鼓励文化多元、反对政治和宗教势力干预社会文化,强调“自由而丰富的社会文化不仅是以色列精神的载体和媒介,更因其生动表达了各类观点与诉求而成为社会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是犹太民主国家的重要构成”^⑤。在 2019 年竞选纲领中,工党呼吁“支持每个人不受歧视地享有爱的权利,也支持每个人自由地选择其性别,因而将致力于为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争取完全平等的社会权利”^⑥。

在实践上,工党基于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国家应当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监管和公正的分配使全体国民共享发展红利,防范社会两极分

① 《以色列工党党章(2009年修订版)》(希伯来文),以色列工党网站,https://www.labor.org.il/downloads/lpf_huka_050809.pdf,登录时间:2020年2月16日。

② 《以色列工党2015年议会大选竞选纲领》(希伯来文),以色列工党网站,https://www.labor.org.il/articles.html,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8日。

③ 《以色列工党党章(2009年修订版)》(希伯来文)。

④ 参见“Labor Party”,*The 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https://en.idi.org.il/israeli-elections-and-parties/parties/labor-party/,《以色列工党2015年议会大选竞选纲领》(希伯来文)。

⑤ 《以色列工党2015年议会大选竞选纲领》(希伯来文)。

⑥ 《以色列工党2019年竞选纲领之LGBT社群的平等权利》(希伯来文),以色列工党网站,https://www.havoda.org.il/wp-content/uploads/2019/03/A4.pdf,登录时间:2020年1月18日。

化,进而保障民众权益的实现,促进社会正义与公平。与此同时,它还主张依靠国家福利体系和工会组织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及公共服务领域给予民众关怀和帮扶,减少失业人口,消除贫困现象,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正义,推动以色列社会形成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安居乐业的新面貌。^①

2. 解决以巴冲突的“两国方案”

与巴勒斯坦的冲突是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也是以色列民众的核心关切。鉴于这一冲突长期持续且数次引发安全危机,与之相关的政策思考逐渐从实践范畴溢入政治思想领域,成为以色列各政党意识形态的构成要件。就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来说,“两国方案”是工党解决以巴冲突的“药方”。

“两国方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委任统治时期起,便一直是解决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代表性政策。该方案最早出现在1937年英国政府针对当地阿拉伯人暴动的调查报告中:“(阿拉伯和犹太)两个民族的理想无法调和在一国之中而得到实现。……英国应结束对当地的委任统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这一地区应当分别建立起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②1947年,基于该方案的“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成为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强调“英国政府必须在1948年8月1日前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不晚于1948年10月1日,巴勒斯坦境内应分别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③“两国方案”由此成为国际社会处理相关问题的基本思路。

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成立,巴勒斯坦问题再度升温。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以色列同邻国关系趋缓与巴解组织影响力的扩大,该问题已经逐渐上升为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同一时期,击败工党上台执政的利库德集团在该问题上立场强硬,宣称“据犹太教经典《托拉》(Torah)记载,以色列国的疆域当从约旦河直抵地中海,而西岸地区与加沙地带自然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力主兼并上述区域并彻底消灭巴解组织。^④20世纪90年代初,重新执政的工党回归“两国方案”,坚定主张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以巴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同巴方签订《奥斯陆协议》,为彻底解决冲突构建基本

① 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22-452.

②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Peel Commission’)”, *United Nations*, <https://unispal.un.org/pdfs/Command5479.pdf>, 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3日。

③ “Palestine Plan of Partition with Economic Union-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81”, *United Nations*, <https://uniteapps.un.org/dpa/dpr/unispal.nsf/9a798adbf322aff38525617b006d88d7/7f0af2bd897689b785256c330061d253?OpenDocument>, 登录时间:2019年11月23日。

④ Walter Laqueur and Barry Rupin, eds., *The Israel-Arab Read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8, pp. 206-207.

框架。

尽管《奥斯陆协议》因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Second Intifada) 爆发而遭遇严重挫折,但“两国方案”仍是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坚持的内容,也是工党相关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基础。在 2015 年竞选纲领中,工党表示“将致力于在双边、区域和国际框架内恢复政治谈判,以期在两个民族、两个民族国家的原则下同巴勒斯坦人达成一项最终地位协定”^①。而在 2019 年竞选纲领中,工党再次强调“将真诚地为达成一项政治协议而努力,以两个民族各自一国为基础同巴勒斯坦人分离”^②。

(三) 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与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异同

政党意识形态是具有高度实践导向的政治理论,它以改变、塑造其理论的实际环境为目标,并受到实践环境反作用的影响。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到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向,是工党基于其意识形态理论实践环境的改变做出的相应调整。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继承和超越,二者既有共性,又存在明显差异。

从共性来看,转变前后工党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导向相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内涵体现出这套意识形态力求实现的基本价值。首先,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所代表的藉由规范化的政治途径来解决棘手问题的思路,本质上是以色列“鸽派”安全理念的展现。其次,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不仅追求在犹太社会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还与劳工学说一道,寻求藉由犹太劳工的生产劳动推动当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增长,体现了平等、公正、自由、进步等价值。再次,国家主义关于国家角色和职能的思考与强调,体现出意识形态对于“大政府”价值的偏好。这些基本价值为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所继承。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关于以色列经济发展、政治生活、社会民生等领域的政策构想,同样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公平、自由、平等、进步等价值。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发展思路和社会民生政策仍然主张政府在国家公共事务中承担必要职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大政府”价值的坚持。而“两国方案”所强调的依靠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巴以冲突,显然延续了“鸽派”的安全理念。

从差异来看,工党意识形态在转变前后的理论内涵和特质显然不同。其一,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聚焦建立犹太国家,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则聚焦以色列国家

① 《以色列工党 2015 年议会大选竞选纲领》(希伯来文)。

② 《以色列工党 2019 年竞选纲领之国防安全政策》(希伯来文),以色列工党网站, https://gallery.mailchimp.com/857e4ea6d0e837a3f4cd06909/files/02b4b6dd-5d44-4e30-b2fc-795b8b0a51ef/mitve_brochure_2143.pdf, 登录时间: 2019 年 11 月 28 日。

治理,二者在理论内涵上各有侧重。换言之,尽管仍冠以“复国主义”,但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中有关复国的内容已经大幅减少。其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以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则以社会民主主义作为理论支撑,社会民主主义取代社会主义成为工党意识形态的主要理论基础。其三,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由针对犹太民族和复国运动的思想学说构成,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则由宽泛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特定的安全议题组成,转变前后工党意识形态的整体理论性以及同实践环境的契合度截然不同。由此,尽管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对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继承和超越,但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淡化了复国主义,突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其理论内涵的整体理论性降低且趋于议题化。

三、意识形态转变与以色列工党的衰落

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到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转变,是工党在意识形态层面针对导致其衰落的主要原因作出的回应。因此,透过意识形态的转变,可以看到导致工党衰落的社会、理论和现实政治原因,即以色列社会环境剧变、基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弊端凸显、工党组织力量的削弱等。

(一) 以色列社会环境剧变

以色列建国后,国内犹太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本为工党所熟悉的社会环境逐渐消失。

复国主义运动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社会处于立国建制阶段,整个社会分工协作基本都围绕建立犹太民族国家这一根本目标运转。复国主义运动建立的犹太民族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等机构从当地阿拉伯居民手中购买或租赁土地后,将这些土地分派或者承租给各复国运动团体和组织,用以开展生产建设,以此来拓展犹太社区规模以接收更多的犹太移民。^①以色列建国之初,严峻的安全形势使得迅速提升国防能力成为保障国家存续的根本任务,当地犹太社会因此仍然处于立国建制阶段。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随着安全形势的显著改善,以色列社会从立国建制阶段进入发展建设阶段。繁荣经济、改善民生逐渐取代建立国家、保家卫国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也成为民众对执政党国家治理目标的主流预期。用当时以色列民众的话来讲,犹太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即“我们终于能安安稳稳地过正常生活了,不用再没日没夜地担惊受怕、备战备

^① Anita Shapira, *Israel: A History*,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8-52.

荒了”^①。而对于一直主导犹太政坛的工党而言,这一改变意味着该党所熟悉并施加影响的犹太社会一去不返,以色列的建国政党因而需要对此前习以为常的治理思路和行为模式作出全方位、深层次的调整。

与此同时,以色列建国后的短短数年间,大量犹太移民涌入该国,当地人口结构彻底改变,原本与工党政坛主导地位相契合的社会人口环境不复存在。据统计,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的犹太人口为716,668人,此后短短5年间,该国便吸收了723,809名犹太移民,迁入的犹太移民人口超过了建国时的犹太居民数;而在建国之初工党连续执政期内,迁入以色列的犹太移民人口总计达1,680,170人。^②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以色列人”同亲历复国运动的犹太劳工和移民先驱在成长经历、教育背景、生活条件上存在明显差异。他们深受移民来源国影响,难以在短期内真正理解、认同工党的治理思路 and 模式,更遑论有效内化工党的意识形态。此外,移民的激增自然稀释了犹太劳工和移民先驱占国民人口的比例,而这两大群体正是工党成员的重要来源和主要支持者。因此,在以色列建国后的数年间,当地社会原本同工党及其意识形态相契合的社会人口结构逐步消失。

(二) 基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弊端凸显且逐渐失灵

以色列建国之初,基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工党政府实行的政策使以色列迅速奠定了国力基础,提升了国防能力,从而能够真正立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发生变化,这些政策的弊端凸显且逐渐失灵。

首先,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导致以色列经济结构失衡,对国民生活水平产生了消极影响。工党政府采取干预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将关键资源收归国有,政府指导经济运行,国有及国营企业把控国家经济命脉。当时工党政府以重工业为国家优先发展的经济重心,将各种资源都集中于该部门,这直接导致以色列经济结构的失衡。据统计,1950年至1972年以色列的工业出口额由1,800万美元跃至9.2亿美元,增长了50余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3%。^③在激增的工业出口额中,由冶金化工、矿石开采、机器制造等产业组成的重工业部门出口额占比过半,且比重逐年增加。以1967年至1970年这一时段为例,重工业部门分别贡献了当

^① Ben-Zion Zilberfarb, “From Socialism to Free Market: The Israeli Economy, 1948–2003,” *Israel Affairs*, Vol. 11, No. 1, 2005, pp. 12–22.

^② Itamar Rabinovich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 Documents and Readings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Pre-1948 to the Present*,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575–576.

^③ Hanan Sher and Moshe Aumann, eds., *Facts About Israel, 1979*,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1980, p. 189.

年工业出口额的 56.3%、59.6%、60.7% 和 61.0%。^①

多数资源都流向重工业部门导致以色列其他产业发展迟滞,国民生活水平因此受到影响。建国初期的以色列基本消费品极为匮乏,肉、蛋、奶全部限量供应,民众的烹饪食材一度只有冻鱼和茄子,以至于人们为了减轻对单调食材的厌倦,创造出了不下 20 种茄子烹饪方法。工党政府承诺为新移民提供住房,但因建筑业产能受限,多数新移民只能一家老小长期栖身于简陋、拥挤的过渡性营房中。待新房终于修好交付,他们却发现这些房屋普遍面积狭小、房间偏少、质量粗劣,实在无法令人满意。^②可见,在基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经济政策环境中,国民生活水平为国力基础的迅速上升作出了巨大牺牲。

其次,工党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加剧了社会群体间矛盾,疏远了民众同执政党的距离。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色列出台《义务教育法》和《国家教育法》,以规范教育体系、统一教学内容和启动义务教育,结束社会中不同团体各自办学的乱象,由此建立起一体化的以色列现代教育体系,为国家发展培养现代人才。但是,这两部法律中关于“禁止开办由不同团体资助的意识形态教育分支或机构”和“教育内容应以宣扬国家和传统为主导,注重儿童的个性、能力和创造力的提高,关注自然科学、艺术、文化知识”等内容^③,却引起了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根据犹太教保守势力的解读,这是世俗力量对宗教的进攻,意在铲除犹太教的社会影响。犹太教保守势力因此竭力抵制相关政策,最终工党政府只得妥协,赋予宗教界继续兴办传统犹太教学学校的权利。从此,以色列社会的教俗矛盾趋于激化,犹太教也走向工党及其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面对来自全球各地的新国民,急于塑造国家认同的工党政府显得缺乏耐心。由工党主导的国民教育只强调复国运动、劳工精神、以色列国家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和意义,对移民原有的各类思想和文化一味地粗暴拒斥。对此,时任工党领袖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曾表示“我们要抹除移民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任何不必要的差异。”^④政策的强硬和冰冷使民众对工党产生了疏离感。实际上,灌输

① Misha Louvish and Mordechai Nurock, eds., *Facts About Israel, 1972*, Jerusalem: Keter Publishing House, 1973, p. 112.

② Leslie Ste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srael: 1948-1967*, New York: Polity Press, 2009, p. 125.

③ “Education in Israel: Principal Laws Relating to Education”,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principal-laws-relating-to-education-in-israel>, 登录时间: 2019 年 12 月 28 日。

④ Raphael Cohen-Almagor, “Cultural Pluralism and the Israeli Nation-Building Ide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7, No. 7, 1995, pp. 461-484.

式的国民教育内容乏味、形式单一,对国民意识的形塑效果值得商榷。在当时年轻人的眼中,“‘热爱祖国’给人感觉就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所谓复国主义者、移民先驱,就是那些喜欢谈论陈词滥调但却从不行动的人。”对于多数新国民而言,“‘复国梦想’或‘民族复兴’这样的话语仅仅是一堆抽象词汇,复国主义则是没有意义的老生常谈”。^①

再次,工党政府的国防安全政策同激昂的社会情绪相悖,难以获得民众认可。工党的安全策略凸显审慎务实特征,旨在确保国民的绝对安全和对国土的完全控制。它集中体现在工党政府对占领土地的处理上。1948年至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实现逆转而取胜。在停战协议签署前夕,以军将领曾建议工党政府乘势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地区,但被总理本-古里安以“国家安全和社会建设是当前的首要关切”回绝。^②战后,初生的以色列全力投入发展,通过快速工业化奠定国力基础。在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再次取胜,向南兼并整个西奈半岛。当时已经退休的本-古里安表示,“如果让我在土地少、安全高的‘小以色列’和土地多、安全低的‘大以色列’之间做选择,我会选择前者……为了和平,我们必须退回到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③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转危为安,战后工党政府同埃及签署《西奈临时协定》,承诺退还此前占领的土地。这一协定不仅使以埃关系正常化,还使阿拉伯国家再难合伙对以色列开展军事行动,因此被认为是阿以迈向和平的重要一步。

然而,对于既恐惧战争又因胜利而亢奋的以色列民众而言,工党理性的安全政策难以获得多数人认可。197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5%的犹太青年学生和47%的成年公民反对撤离占领土地。相比之下,两个群体中支持在加沙地带等争议地区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的比例分别高达80%和65%。^④可见,工党的安全政策为以色列搏得关键利益,却未能为该党赢得民众支持。

(三) 工党组织力量的削弱

政党的组织力量是其开展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目标的基础。随着以色列发展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工党的组织力量却大幅削弱,其政治表现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① Lilly Weissbrod, “From Labour Zionism to New Zionism,”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0, No. 6, 1981, pp. 777-803.

^② Anita Shapira, *Ben-Gurion: Father of Modern Isra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73.

^③ Leslie Stein, *The Making of Modern Israel, 1948-1967*, p. 320.

^④ Y. Levi and E.L. Guttman, *Values and Attitudes of Pupils in Israel*, Jerusalem: Institute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1976, p. 34, p. 50.

一方面,工党的组织规模不断萎缩。据统计,1950年工党党员人数达67,132人,仅3年时间这一数字便翻了一番,达到132,472人,占当时以色列各政党党员总数的一半还多。^①而考虑到主要归于工党掌控的犹太工人总会多达70余万人的成员数量,该党实际所享有的组织规模优势十分突出。^②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直至90年代,党内元老权力斗争引发工党分裂、主要领导人擅自加入1977年利库德集团内阁、高层工党党员接连爆出贪腐丑闻,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发生与曝光导致工党的公共形象受损,其党员及支持者数量曲折下跌。“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于2000年9月爆发并持续近5年,使以色列蒙受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宣告了工党对巴勒斯坦问题政策的失败。这一事件导致工党大失民心,组织规模大幅萎缩。2018年的数据显示,当年年初的工党党员人数仅略微超过60,000人,甚至低于建国初期水平。^③

另一方面,工党领导层人才断档。工党曾人才辈出,既有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等开国领袖和党内元老,也有摩西·达扬(Moshe Dayan)、西蒙·佩雷斯(Simon Peres)、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等少壮才俊。他们构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取得成功、推动以色列完成建国大业的中坚领导力量。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党遭遇领导层人才断档的危机,频频更换的领导人始终无法带领政党摆脱衰落困境。据统计,自拉宾遇刺至今,工党先后产生了12任党首,由9人分别担任。这12任党首任期内,以色列工党的选战表现屡创新低,社会影响力加速下滑,意识形态内容议题空心化,不仅未能恢复政治主导地位,反而沦为以色列议会中的边缘政党。

四、以色列工党复兴所面临的挑战

意识形态转变折射出的工党衰落的原因表明,寻求复兴的工党面临社会、理论和组织三重挑战,需要适应剧变的社会环境,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积蓄和恢复组织力量。

^① Pinchas Rimon, *The Story of Mapai: Israel's Labor Party*, New York: Shulsinger Brothers Linotyping & Publishing Company, 1956, p. 16.

^② Misha Louvish, ed., *Facts About Israel, 1959*, Jerusalem: Information Division of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1960, p. 182.

^③ Gil Hoffman, "Labor Party Membership Surpasses 60000,"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25, 2018.

（一）适应剧变的社会环境

相较于工党主导时期,今天的以色列社会已经大不相同。其一,国民人口结构改变。随着海量移民涌入和人口自然更迭,信仰先驱精神、劳工价值和阶级理念的工党追随者在以色列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分工多样、价值多元的中间阶层成为国民主体。其二,社会文化元素更加多元。以色列不再独尊政治意识形态为社会文化主要元素,而是包容公民文化、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世俗价值、族群理念等多元文化竞合并存,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下降。其三,经济模式彻底转向。利库德集团主导政坛后,大刀阔斧地对以色列经济展开市场化改革,大幅剔除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全面私有化、严打垄断力促竞争、放松外汇管控、改革福利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多管齐下,颠覆了工党时期以国有资本、国营企业、平等主义福利国家为要素的传统经济模式。

不难发现,以色列社会的发展走向并未同工党相向而行,适应其变化成为工党需要直面的现实挑战。工党的适应性调整必须在秉承自身传统与契合社会新貌之间把握平衡,从而促使本党在同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将社会认可转化为选民支持。首先,尽管工党已经由复国运动中的阶级党渐变为全民党,但鉴于目前它已难以吸引选民支持,该党格外需要密切同特定社会群体的联系,以此来培养稳定的选民基础及本党票仓。^①其次,今天的工党需汲取早期工党的意识形态构建经验,即在坚持基本价值原则的基础上,灵活、务实地扩展意识形态理论内涵,丰富其中的社会文化元素,以争取更多社会群体的支持。最后,在认同和借鉴利库德集团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下,针对该模式所导致的诸如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贫困人口增多等弊端^②,工党要勇于坚守传统理念,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角色和社会民生领域的根本责任,致力于保障民众权益,促进民众福祉。

（二）推进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和创新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工党之所以能够在复国运动中和建国初期取得突出成就,主要归功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对现实情势的正确把握和对政策实践的有效指引。相比之下,近年来政治地位持续衰落的工党越来越受到选票的裹挟,疲于回应社会热点问题、迎合多数选民偏好,却缺少关于国家发展的全局性、深层次理论思考。以色列传统左翼报刊《国土报》(Haaretz)认为,现在的工党唯选票

^① 2018 年笔者曾对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大学、特尔海学院等以色列高校学者就相关话题进行访谈后所得观点。

^②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Economics Surveys: Israel 2016*,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6, pp. 9-14.

是瞻,其政策思考热衷于在不同的社会焦点与选民偏好之间来回穿梭,却唯独难以体现自身的整体性思考。^①由于缺乏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工党为热点问题开出的药方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限于从表面上进行回应而并未从根源上寻求解决办法,难以真正促进社会进步。

与此同时,理论思考的缺失还模糊了工党的政策特征,实际上造成了它和以色列其他党派的趋同。以安全政策为例,前有时任党首艾萨克·赫尔佐格(Issac Herzog)力促党内同僚支持利库德政府旨在孤立巴勒斯坦的单边隔离计划,后有前党首阿维·加贝(Avi Gabbay)公开表示“一个统一的耶路撒冷比国家安全更重要”^②。这一切都表明,工党的安全政策背离其传统思路而同其政坛对手接近。对此,有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这就是工党的政策意见,那我们不如直接把票投给右翼政党。”^③这种趋同性加剧了工党的政治困境。

显然,工党迫切需要推进意识形态的理论建设和创新,推动用以研判社会现实、指引政策设计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时俱进。一方面,工党需要补足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所缺乏的理论内涵,形成该党意识形态针对以色列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性理论建构,以此来统领、指引其政治实践和政策逻辑。另一方面,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创新,应当把握好继承传统理论内涵和适应社会剧变之间的平衡,充分展现工党意识形态的理论特质及优势,进而使工党能够形成独具智慧与特色的治理目标和政策思路。

(三) 积聚和恢复本党的组织力量

组织力量是政党开展政治活动、实现政治目标的基本保障。对党员规模尚不及建国时期水平的工党而言,寻求扭转颓势,恢复本党的组织力量势在必行。

首先,工党需扩展党员规模并争取更多国民的认同和支持,尤其需要注重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为本党培育稳定的党员来源和选民票仓。这要求工党通过调整政策思路、改善公共形象、强化意识形态宣传、畅通党内晋升通道等一系列途径予以实现。

其次,工党需要发展一批兼具深厚学识和丰富经验,并且高度富有责任心与使命感的干部人才,为实现长期良性发展建立人才储备。干部人才储备可通过培养党内成员、遴选吸纳社会精英等途径逐步实现。

^① Tal Harris, “Gabbay, We Have to Go Back to Ideology,” *Haaretz*, September 17, 2018.

^② Abe Sailerstein and Nathan Hersh, “Israel’s Left Goes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7.

^③ Aviad Kleinberg, “If This Is the Left’s Leader, Why Not Just Vote for the Right?,” *Ynet News*, October 20, 2017.

最后,工党需要充分发掘和动员现有的组织力量,促使党内成员为拯救陷于困境的政党贡献力量。这要求工党进一步明晰和保障党员权益、平衡党员的权利责任比重、突出党员的重要地位,同时严明党内纪律、统一全党认识,由此为高效调动和运用本党的组织力量构建保障,创造更大便利。

五、结语

从政党意识形态的实践效果来看,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之于工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正是凭借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多元内涵和威权性质,工党才得以有效动员犹太民众和调集社会资源,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近似真空的巴勒斯坦地区建成犹太民族国家,并迅速为国家存续奠定基础实力。另一方面,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僵化也致使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同以色列的社会现实脱节,以这一学说为理论支撑的工党政策因此逐渐失灵,加剧了工党政治地位的动荡和衰落。

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是衰落中的工党为挽回颓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的仓促调整。连续的议会大选失利使获取选票愈益成为工党的主要目标,也使意识形态从工党解读社会环境、引领国家发展的理论工具渐变为其回应社会热点、争取选民支持的政策拼盘。这限制了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深度,限制了其社会吸引力和政策指引力的提升。同时,以色列社会的剧烈变化又使走下神坛的工党疲于应对,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乱了阵脚。急于适应剧变的工党盲目地同过去的意识形态划清界限,这不仅导致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难以从既有的思想成果中继承精髓、汲取养料,也使工党的传统特质逐渐模糊,在政坛中的辨识度大幅下降。

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到后劳工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是困境中的工党为重回正轨采取的重要举措,目前看来其成效较为有限且利弊难辨。同时,工党的衰落和边缘化是一系列因素复合叠加的结果,要改变和扭转这种局面,工党须相应地在思想、组织、制度等层面作出综合调整。此外,同工党主政时期相比,当前以色列的社会人口结构、国民价值偏好、国家发展目标等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状况对工党日趋不利。因此,从衰落迈向复兴的蜕变对工党而言,既是对其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也势必是一段漫长的历程。

(责任编辑:邹志强 责任校对:包澄章)

Israel was very rare. It remains to be seen that whether the anti-epi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Hamas and Israel will expand new cooperation fields or bring regional peac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use mutual trust theory to analyse whether the two countries can reach limited consensus under common threat, and then deduct the possibility to eliminate persist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Key Words Anti-COVID-19 Cooperation; Mutual Trust Theory; Israel; Hamas; Military Conflict

Author ZHANG Yuan, Ph. D., Profess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67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Israel Labor Pa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Transformation

Abstract As the founding party of Israel, Israel Labor Party had been in power for many year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1977,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Israel Labor Party began to decline. Israel Labor Party has never been able to wi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number of votes and seats has repeatedly hit record lows, and its decline has intensified. One of the key measures taken by Israel Labor Party in response to the decline of its political status was to shift its ideology from labor Zionism to post-labor Zionism.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change in ideology not only reflects the drastic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obvious and tending to failure of the previous policy, and the weakening of party organization, which has caused the declin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arena, but also reveal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faced by Israel Labor Party's political revival, which include how to adapt to the drastic changes in society,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theories, and restore its own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Key Words Israeli Politics; Israel Labor Party; Party Ideology; Labor Zionism; Social Democracy

Author WU Shiyao, Ph. D., Lectur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85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Arab Countries: A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Locating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sia, Africa and Europe, and adhere to the world's energy and trade channels, the Arab countries are the important nod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various mechanisms such as the China-Arab States Cooperation Forum,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have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ir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Arab countri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go global". The political security situ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Arab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ir natural endowme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obvious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ory and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is paper builds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Arab countries with the factors of opportunity, institution and risk, and calculates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dex and comprehensiv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dex of the Arab countries. The paper also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the Arab countries, and explores the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Arab investment environment, so as to lay a basic foundation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invest in Arab countries and choose specific investment destinations.

Key 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ab Countrie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uthors WEN Wei,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WU Hao, Professor,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107 China-Arab Financi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key to the financial integration